

从沪上血路到金陵浩劫 南京大屠杀之肇始不在南京



■侵华日军罪行照片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资料图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多部描绘全民血肉抗战的影视作品纷纷亮相。其中,申奥导演执导的电影《南京照相馆》票房截至 8 月下旬已破 28

亿元,豆瓣评分 8.6 分,成为今年暑期档首位爆款。这部电影取材于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引发大众强烈共鸣。历史上,屠杀的血腥并不止于南京城,而是从更广阔的沪宁线一路蔓延而来。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极重视他成长年代所经历的血泪

抗战史,生前想写一本“抗战回忆录”,以个人的回忆为纲,写下他在抗战岁月中的见闻。可惜最后因病不能完成。但他曾通过搜集发掘中外史料和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录,为读者揭开南京大屠杀的来龙去脉。

以下内容节选自他的论文。

奸,除日军和我方少数幸存者之外,几乎就别无见证之人了。

我们要知道,南京大屠杀之所以弄得举世皆知,实在是留在南京的一群欧美人士所揭发出来的。当年参加屠杀的日本兵,除极少数有良心、而今日又无惧于极右派暗杀威胁的老年退伍军人之外,至今仍守口如瓶。直至现在还有极右派在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虚构的。

杀人竞赛,不在南京

所以在日军当年从杭州湾和上海分三路对中国军队向南京作包围追击时,这个京沪杭三角地带就被它杀成一片血海,而外人不知也。请看那铁证如山的大屠杀文献上,最为人所知的

所谓“杀人竞赛”,日本媒体上所报道的“百人斩”,便是在此时此地发生的。那两个杀人凶犯,向井敏明和田野毅(当时日方媒体亦写作野田岩)二少尉,当年被日本人崇拜为英雄人物的照片,即拍于 11 月 29 日占领之常州。显然的,这时他二人已经变成杀人的“英雄”了,新闻记者才替他们拍下照片。

杀人竞赛的最初新闻稿,则是 12 月 5 日发于句容,此时他二人已各杀 89 和 78 人之多。5 天之后(12 月 10 日)在紫金山麓,他二人的杀人记录,已增至 105 人和 106 人。如此推算,他二人大致每天要杀 3 至 5 人。杀一百人需 20 天,这样则他二人开始杀人竞赛,就不得迟过 11 月 15 日了。换言之,这两个刽子手是在日军攻占

苏州(11 月 19 日)之前就开始的。只举此一例,我们就可以肯定,南京大屠杀是从上海开始的(关于此次杀人竞赛在东京《日日新闻》12 月 13 日报道的日文剪报和译文,见《铁证如山:日本军阀侵华罪恶实录》)。

天堂变成地狱

为吾人远在战时即已确知之事:日军于 1937 年 12 月 13 日攻陷南京之前,广阔的京沪杭三角地区(也是当年中国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天堂地区——人口最密集、资产最丰富的地区)早已被它杀成一片血海,被杀被奸的人数甚或超过南京入城之后。日军在这地区所干的屠杀勾当,那时东京《日日新闻》的三位记者(浅海、

光本和铃木)如不把这宗“刀劈百人赛”以他们的生花妙笔写成“捷报”传向东京,外界又何由得知?贤明的读者,您相信“刀劈百人”只是个孤立的事件吗?刀劈数十万人,奸杀数万妇女,竟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被蒙混过去了。对此,笔者实心有不甘也。对我们历史家来说,他们至少在历史上也蒙混不了。

其实南京城内的大屠杀,原亦神不知鬼不觉。不意却有《纽约时报》的记者德丁(F. Tillman Durdin),及上述拉贝、马骥(John G. Magee)、费齐(George A. Fitch,自取中文名曰费吴生)和贝茨(Miner Searle Bates,贝德士为误读)诸西人所目睹,始致腾喧报端,震惊世界也。

贝茨曾为近现代史家郭廷以教授的英文老师,战后返美,曾与笔者比邻而居十余年;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组(University Seminar)中之同修也。郭老师在纽约时,我曾介绍他们白头师生在哥大重晤。

余识老友德丁伉俪亦逾 40 年。彼每为余言潜出南京之经过曰:“Driving over layers of dead bodies.”(车子从数层死尸上开过去)。其情其景深入魂梦,至老其惊恐之色未稍易也。在日军之严密封锁之下,没有他们的报道,那时有谁知道日军在南京的禽兽之行呢?事实上,“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屠杀)一词,便是德丁所撰,由《纽约时报》首先揭发的。

他们这批欧美人士在日军破城之前,曾对日本人有幻想:有谁知道,日本人竟是一群比魔鬼更魔鬼的魔鬼呢?这群欧美人士目睹日军之奸掳焚杀后,才成为“魔鬼控诉人”。

“敦刻尔克”式壮举,民族工业内迁的抗战往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复旦大学决定成立军训委员会,由林继庸任主任,指导军训,以备“随时应召”;学校还增设军事化学课程,林继庸亦是主要授课老师。

1932 年淞沪抗战期间,他指导复旦化学系师生制造了多种弹药,供给抗日前线,还亲手组装了一枚饭盒形状的炸弹,由朝鲜义士尹奉吉带入日军集会的虹口公园,一举炸死、炸伤了多名侵华日军头目,这就是著名的“虹口公园爆炸案”。爆炸计划完成后,因日军持续搜捕,林继庸被迫前往欧洲避难。

1936 年,眼见日寇加紧侵略,林继庸毅然回国,进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专门委员名义兼任工业联络组组长。工业联络组的任务是联络工业界人士,协助资源委员会的发展。为全面了解全国工业状况,林继庸首先着手开展全国工业普查。这次工业普查收集的资料相当完整,为国家以后的工业布局打下了良好基础。

烽火中的工业内迁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我国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地区。林继庸敏锐意识到

这些工厂在日军压境下难免被损毁或被敌利用,便向资源委员会提议将上海各工厂设备拆迁转运到内地。

8 月 10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林继庸被任命为主任委员。尽管日寇加紧空袭,市内人心惶惶,林继庸仍排除万难,奔走呼号,协调组织卡车、轮船、挑夫等转运工厂设备、人员。他连日在上海南市、闸北等地奔走,左脚受伤肿痛,医生警告有截肢危险,他却悬挂着左脚坚持办公。

林继庸对民营工厂“一面施以政治压力,一面给予经济利益,一面晓以爱国情感”。工业界同人见他奋不顾身,迁厂工作更加卖力进行。上海市总计迁出民营工厂 146 家,物资 14600 余吨,随行技术工人 2500 余人。

9 月 27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成立。11 月 14 日,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成立,林继庸担任委员,前往苏州、常州、无锡一带指导物资抢运工作。当各厂物资由上海运到武汉后,工矿调整委员会在武汉设立办事处,林继庸任主任,采取紧急措施抢救镇江及沿江至武汉一带的物资,并协助将迁移工厂安置在汉口,确

保迅速复工。

由于战事吃紧,汉口各工厂再迁入四川等地。1938 年 1 月,林继庸转战重庆,协助厂家内迁。他寻觅厂址,测量地亩,筹划机器堆栈、木船运输等,并邀集已到渝厂家组织“迁川工厂联合会”,搭建起沟通政府与实业界的桥梁,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工厂入川铺就坦途。

这一批工厂迁移至西南大后方后得以继续生存发展,为几乎没有工业基础的西南大后方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他们与西迁至后方的高校、军工企业一道保留了中国工业文明的火种,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工业基础。

调解纠纷保障生产

抗战期间,林继庸在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主持工作,积极帮助民营厂矿复工生产,排难解纷,确保战时工业顺利发展。

大鑫钢铁厂业主余名钰和民生公司的卢作孚合资经营渝鑫钢铁厂时,因债务发生纠纷。双方商定由林继庸裁决,并立字据承诺遵守决定。林继庸规定十天内双方不得说情,否则作败诉论。十天后,他裁决民生公司赔偿 1000 万元给大鑫公司,卢作孚痛快履行。

申新纱厂工人曾因伙食问题闹事,林继庸到厂与工人共餐,吃得比工人还多,证明伙食不错。饭后请工人代表到经济部就餐,他们发现经济部伙食还不如厂里。林继庸又邀请代表们参观其简陋的办公室兼卧室,工人代表无话可说,不敢再以伙食问题罢工。抗战胜利后,林继庸担任粤桂闽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处理局长。在海南岛视察时,他发现日军留下的两个铁矿集中营有 3000 多苦工,生活环境恶劣。他冒险从应解送国民政府的 9000 万元中抽出 7000 万元作为遣散费,妥善安置这些苦工。

林继庸于 1985 年逝世。他著有《皮革》《民营厂矿内迁纪略》《化学兵器科》等书,其中《民营厂矿内迁纪略》详细记录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工业内迁历程。

李学博

遗失声明

兹有上海市徐汇区康健街道老年协会财政票据领购证不慎遗失,编号为 04-2014-034,特声明作废。



■实业家林继庸

回顾抗战那段烽火岁月,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保存民族工业火种、支撑抗战经济命脉而奋斗的先驱。林继庸(1896~1985)就是这样一位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的爱国实业家,他主持的工厂内迁工作被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

从化工学者到抗战先锋

林继庸是广东香山人士,其曾祖父林谦是当地著名乡贤。林继庸早年曾为同是香山人的孙中山先生担任护卫,后赴美攻读化学工程,1926 年学成归国后曾在上海开办化工厂,1928 年至复旦大学任教,历任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